

# 香港傳真

(香港)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 
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

No. 2012-7

2012年3月1日

\*\*\*\*\*

## 人在岔路口

東方航空公司 劉江波

兔年拽走了冬天的尾巴，龍年噴吐著蓬勃的氣息，又一個春天款款而來。我們遙望璀璨的星空，在中國群星劃過天際的軌跡上，分明鐫刻著舉世公認的輝煌。然而，富起來的國民遠談不上幸福，口袋鼓了，心裡卻慌了，全社會的浮躁和焦慮，讓草民們和這個國家一樣，走到了抉擇的岔路口。

岔路口，人生命運的分水嶺。“人的一生雖然漫長，但關鍵時刻只有幾步。”人生無非就是選擇，最重要的選擇不過三五次。

我時常緬想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——“老井岡”賀敏學。他既是我父母的老領導、同鄉，又堪為兄長。在他諸多的傳奇故事中，最令我血脈賁張的還是他猝不及防被推到岔路口時的人生抉擇。

那是 1927 年，毛澤東在秋收起義途中，第一次從一個叫王新亞的人那裡獲悉，井岡山上有個叫賀敏學的共產黨員，他的胞妹賀子珍是井岡山第一個女共產黨員。

23 歲的賀敏學重義氣、講友情，豪爽耿直、嫉惡如仇，在當地很有名望。賀敏學有個同窗好友袁文才，袁文才有個同年出生的“老庚”（拜把子兄弟）王佐。袁文才、王佐在井岡山各拉起一支農軍，志同道合，彼此照應。

1927 年 10 月初，秋收起義失敗後，毛澤東決定率餘部上井岡山。恰逢賀敏學下山尋找黨組織，與“三灣改編”的隊伍相遇，遂託人轉告袁文才。

賀家兄妹與袁、王之間的關係如清風朗月，磊磊落落：王佐信任袁文才，袁文才信任賀敏學，賀敏學與賀子珍一奶同胞，賀敏學是核心人物。賀家兄妹在袁、王與毛澤東之間穿針引線，後來就有了毛澤東、袁文才 1927 年 10 月 6 日在大倉村的會見，史界稱之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立的標誌性事件。

井岡山的革命如火如荼，鬥爭卻異常殘酷。1930 年 2 月 24 日，袁文才、王佐被一些私心很重的紅軍負責人錯殺。這一對 32 歲的生死老庚，做到了同生同死的指天盟誓。賀敏學聞訊悲痛欲絕，得知袁、王是被人冒充自己的筆跡寫條子騙下山的（有一說是冒充毛澤東的筆跡），他像火山般爆發！想當初，惺惺相惜一起鬧革命，給袁文才寫信相約搞暴動，井岡山上一同鑽密林；到如今，兩紙信箋一真一假，情同手足的摯友竟死於天真的信任，死於自己人製造的陰謀！他悲憤，他抗議，他去跟人家理論！

1930 年 3 月初，袁文才的妻兄和王佐的胞兄“反水”，井岡山易幟，存在了兩年零四個月的根據地繼而失守。

1930年10月，紅軍的肅反運動達到高潮。一些深諳鬥爭哲學、熱衷製造糾紛的紅軍負責人借打“AB團”（指混入革命隊伍的富農反革命分子）大搞逼供信。“富田事變”中，賀敏學幾乎被錯殺，一批紅軍官兵被錯殺。

這是一段最暗的日子。一個仗義行俠的熱血青年、年輕的國民黨員，賀敏學在革命低潮時轉而接受馬列主義，加入共產黨。他怎麼也想不通，黨內的恩恩怨怨竟會導致大量的錯殺。

2009年，國防大學金一南教授在其鴻篇鉅著《苦難輝煌》中說，從“四一二”反革命屠殺中過來的人們，深知在危難時刻叛變現象的不可避免和鉅大危害，便自覺不自覺地運用起最後往往傷及自身的鐵腕：肅反。

那個年代的賀敏學，不可能有今天人們的認知，他還在為共產黨內部的打殺而痛苦不堪、愁腸百結。

鬥下去，討回公道？那些引導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，那些被自己領進革命隊伍的，那些被錯殺的，那些錯殺別人之後也成了犧牲品的，斯人去矣，不可復生，公道，還討得回嗎？

拉隊伍，另起爐灶？不啻撕舊傷添新痕，袁文才、王佐們一手創建的根據地，如同坍塌的土牆碎成齏粉，使我之更弱，敵之更強，這兄弟鬩牆、親痛仇快的爐灶，誰人壘得？

回家去，卸甲歸田？知遇之恩也好，兄弟情深也罷，抱憾長天、拱手訣別，老子不幹了！可是，紅潮與白潮相互絞殺的戰爭，正像一把尖利的篋子，在貧瘠的土地上搜刮，銳刺過後留下的，是更加荒蕪的土地和飢餓的人民。卸甲如蛾撲火，無處可歸田，哪裡去尋一副埋頭耕耘的犁耙？

賀敏學無從知道，五年之後遵義會議召開，毛澤東重掌那艘

在風雨飄搖中動蕩不安的航船。而在此時此刻，在殘酷拉鋸、黑暗吞噬的 1930 年，賀敏學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。

26 歲的熱血青年選擇了沉默。

沉默是金。能吞下痛苦、愁結和血淚的沉默，比金子還貴。賀敏學把自己拎出混沌鬥狠，置身於時代舞臺的前沿，馳騁於沙場，縱橫於林莽，在打擊敵人中成長——如同六十多年後鄧小平的“發展是硬道理”。

然而，苦難遠無盡頭。

1934 年 10 月，紅軍主力開始長征，賀敏學與項英、陳毅、龔楚等被留在中央蘇區，迎接他的，是後人稱之為“最為艱苦卓絕”的三年游擊戰爭。

金一南教授說，造就大英雄的時代，即是產生大叛徒的時代；有多少至死不渝的忠誠，就有多少鮮廉寡恥的叛賣。

龔楚，中央軍區參謀長，老資格中共黨員，紅四軍前委常委，曾與毛澤東、朱德齊名。1935 年 5 月，龔楚經不住艱苦環境的考驗叛變了革命。龔楚設計誘捕項英、陳毅。生死關頭的賀敏學，第一個跳起來掏槍，與龔楚進行零距離血拼！1936 年春天，賀敏學被捕。曾經一同出生入死的紅軍將領、如今的“少將剿共游擊司令”、大叛徒龔楚親自審問賀敏學，賀敏學誓死不降。同年 6 月，他趁“廣東事變”之亂逃脫，不料又被抓回。這一次，或許是因為龔楚尚存未泯之良心，記得賀敏學捨生忘死掩護過自己；或許龔楚認為革命已亡，賀敏學毫無價值；或許龔楚還想放長線釣大魚，總之，他放了賀敏學。三十年後，這成了賀敏學在文革中說不清楚的事。

賀敏學重獲自由，他像漂泊的孤舟、離群的落雁，乞討、做

工，艱難地找黨。一日走到粵贛兩省交界岔路口，路牌標示往東，可回江西老家。往西，繼續尋找項英、陳毅，如同大海撈針，風雨困頓、凶險莫測。賀敏學毅然向西走去。一年多後，終於找到項英，經嚴格審查恢復組織關係。

時窮節乃見，一一垂丹青。

在人生的岔路口，項英、陳毅、賀敏學們經受著煉獄之火的極端考驗，選擇了浴血堅持，而龔楚卻背叛了革命。

在革命的岔路口，毛澤東選擇工農武裝割據的正確道路，袁文才、王佐被錯殺，則使革命事業陷入絕境。

“富田事變”中那些被錯殺的紅軍官兵們，他們的目光至今仍與我們深邃相對，讓我們感知錐心刺骨的痛惜，感知悲歌一曲的慨然。

相隔八十多年回頭再看，更見支撐賀敏學堅持到勝利彼岸的，是對共產主義的信仰，是願意為此而奮鬥終身的執著，是不為所動專注於打擊外部之敵而深埋痛苦的毅力。只有理解了那段歷史的人，才能對處在那樣一個悲痛絕望特定關口的賀敏學們感同身受，對他們追隨信仰的堅定意志肅然起敬，對他們用生死關頭的抉擇，把共產黨人的人格詮釋得那麼崇高堅挺，那麼淋漓盡致而感懷不已。

在當下，在時代的岔路口，每一個草民都在關注國家走什麼路，自己走什麼路？這是一場關聯性極強的探索，互聯網的參與使多元的聲音尖銳而深刻，讓我們猝不及防，難免惶惑。可喜的是，80後們正成為主力人群，以其鮮活獨立之思路，與賀敏學們進行著年輕時同樣的探索。所不同的是，前輩們更關注“國”，在垂垂老矣之時，為曾經的千磨萬劫而感慨而審視而不改其一生

所追隨的信仰；80 後們更關注“人”，用他們特立獨行、個性張揚的文字掀起一輪又一輪的中國式網絡爭鳴。

人，不可以沒有信仰。沒有信仰的人，永遠無法做出正確的人生選擇。我的父母無數次講起的賀敏學的傳奇故事，能給大轉型時期的草民們帶來一點點啟示嗎？